



朱熹《中庸》学阐释

A Restatement of Zhu Xi's Study o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乐爱国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朱熹《中庸》学阐释

乐爱国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熹《中庸》学阐释/乐爱国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9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3-18709-6

I. ①朱… II. ①乐… III. ①儒家 ②《中庸》研究 IV. ①B2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7074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30 mm×980 mm 1/16

印 张:19.25

字 数:355 千字

版 次: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00 元

策划编辑:曾忆梦

责任编辑:王 宁 王 强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校对:陈 民

责任印制: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中庸章句》的形成	(6)
第一节 学术背景	(6)
第二节 学思历程	(15)
第三节 成就新篇	(28)
第二章 子思作《中庸》	(39)
第一节 《中庸》为子思所作	(39)
第二节 《中庸》旨在道学之传	(47)
第三节 《中庸》的篇章结构	(58)
第三章 何谓“中庸”	(72)
第一节 二程及其门人论“中庸”	(72)
第二节 “中”：兼中和之义	(78)
第三节 “庸”：平常则恒常	(83)
第四节 “极高明而道中庸”	(89)
第四章 《中庸》之体要	(94)
第一节 论“性”“道”“教”	(94)
第二节 “戒慎恐惧乎其不睹不闻”	(109)
第三节 “君子慎其独”	(116)
第四节 “未发”“已发”与“敬”	(129)
第五节 “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	(136)
第五章 “中庸”与德行	(147)
第一节 “中庸”与君子小人	(147)
第二节 “中庸”与知行	(150)
第三节 “中庸”与“知仁勇”	(152)

第六章 “道不可离”	(163)
第一节 道之体用	(164)
第二节 “道不远人”	(171)
第三节 “行远自迩，登高自卑”	(176)
第七章 “诚”之道	(180)
第一节 “诚”之界定	(180)
第二节 “诚”与天道人道	(187)
第三节 “诚”与“三达德”“五达道”	(195)
第四节 “诚”与“成己”“成物”	(202)
第八章 “尊德性而道问学”	(209)
第一节 “尊德性”与“道问学”	(209)
第二节 朱陆“鹅湖之会”	(215)
第三节 如何“尊德性而道问学”	(220)
第九章 “至诚”与“至圣”	(233)
第一节 “诚”为圣人之德	(233)
第二节 “至诚”与“尽性”	(237)
第三节 “赞天地之化育”	(244)
第四节 “与天地参”与“至圣”	(249)
第十章 “不显之德”	(257)
第一节 “不显之德”幽深玄远	(257)
第二节 “不显之德”的成德之序	(261)
第三节 “不显之德”与“反身以谨独”	(271)
第十一章 “诚”为《中庸》之枢纽	(274)
第一节 《中庸》之枢纽	(274)
第二节 《中庸》与“诚”	(278)
第三节 由“诚”而“中庸”	(281)
结语：“诚”是朱熹学术的最高境界	(287)
主要参考文献	(298)

导 论

清人全祖望称朱熹“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①。朱熹讲“天人合一”之道，察乎天地，涵括世间万事万物，至大而无外，可谓“广大”；深入具体事物，洞悉隐微，涵养心性，至小而无内，可谓“精微”；汇汉考据、词章之学与宋义理、心性之学于《四书章句集注》，集诸儒之大成，可谓“综罗百代”。

朱熹重视读书，尤重“四书”，以为“四书”乃“‘六经’之阶梯”^②。而且，在朱熹看来，读“四书”应当“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③。他还说：

盖不先乎《大学》，无以提挈纲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论》、《孟》，无以融贯会通而极《中庸》之归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④

在朱熹看来，《大学》是纲领，《中庸》是大本；同时二者又相互贯通。这就是他所谓“《大学》是通言学之初终，《中庸》是直指本原极致处，巨细相涵，精粗相贯，皆不可阙，非有彼此之异也”^⑤。

因此，要真正了解朱熹以“四书”学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体系，就应当起始于他的《大学章句》^⑥，而终结于《中庸章句》，以揭示朱熹“致广大而尽精微”幽深玄远的“天人合一”之道，展现其“综罗百代”继往开来之深邃意蕴。

① (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二册)卷四十八《晦翁学案(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495页。

②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七)卷一百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2629页。

③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一)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249页。

④ (宋)朱熹：《四书或问·大学或问》，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515页。

⑤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答黄商伯》(四)，四部丛刊初编本。

⑥ 为此，笔者曾先作《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10)，以入朱熹学术思想体系之大门。

儒家《中庸》学兴盛于宋代。宋初大儒范仲淹、胡瑗、陈襄、欧阳修等，都对《中庸》有所研究。此后，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解说《中庸》，并对《中庸》的思想作了深入阐发。尤其是“北宋五子”，即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程颢和程颐），从理学的角度诠释《中庸》，对《中庸》的思想作了富有创新的发挥。二程门人吕大临、苏季明、游酢、杨时、侯仲良、谢良佐、尹焞等，共同切磋，相互砥砺，也对《中庸》作了各自的解说。

朱熹自十五六岁时开始读《中庸》，三十岁左右而有《中庸集说》，三十五岁前后，朱熹对杨时门人张九成的《中庸解》作了批评。此后，他热衷于《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未发”、“已发”问题，经历了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四十八岁时，朱熹成《中庸章句》，并撰《中庸或问》和《中庸辑略》；六十岁时，正式序定《中庸章句》，从而构建了精到的《中庸》学体系。

朱熹《中庸》学是对“北宋五子”，尤其是二程《中庸》学的继承和发展。但由于二程没有留下传注《中庸》的完整文本，而且在朱熹看来，二程门人也没有能够很好地继承二程的《中庸》学思想，因此，朱熹继承二程《中庸》学思想作《中庸章句》，这本身就是对于二程《中庸》学思想的新贡献。

重要的是，朱熹《中庸》学在吸取二程《中庸》学思想的同时，又有所创新，从而把儒家《中庸》学发展到新的阶段。与作为汉唐《中庸》学代表的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相比，朱熹《中庸章句》提出了许多不同的重要观点和思想，主要有以下九个方面。

第一，与郑玄、孔颖达只是从经学角度解说《中庸》不同，朱熹《中庸章句序》以为《中庸》是子思“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进而提出了“道统”概念以及从尧、舜、禹至孔子、子思、孟子，再到周敦颐、二程的传道系统。而且，朱熹认为，这个传道系统所传之“道”在于“心”，在于古文《尚书·大禹谟》所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他作《中庸章句》正是为了接续这个传道系统。这就把《中庸》摆到了“道统”的位置上加以解说，使之具有了更为深层的理学意味。

第二，与郑玄、孔颖达把“中庸”解说为“中和之为用”而把“中庸”之“庸”诠释为“用”或“常”不同，朱熹《中庸章句》讲“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而且，朱熹把“庸”解说为“平常”，也不同于二程讲“不易之谓庸”，是对二程的“中庸”解说的创新。尤其是，朱熹特别强调“中庸”的“平常”之意，反对把“高明”与“中庸”二者分离开来，片面地讲“高明”，而是倡导一种“行远自迩，登高自卑”的境界。

第三，与先秦以及汉唐儒家强调人之性与物之性的区别不同，朱熹

《中庸章句》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解说为人与物具有共同的“天命之性”，并“各循其性之自然”而有其“道”，又由于气稟的不同，而其性、道各有差异，所谓“修道”则是圣人依据“道”而对人与物作出不同品级的节制和约束，既讲人之性与物之性的共同性，又讲二者的差别性，从而将视野扩展至更加高远的人与自然的统一。

第四，与郑玄、孔颖达把“慎独”理解为“慎其闲居之所为”、“慎其独居”不同，朱熹《中庸章句》认为，《中庸》所谓“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意在“未发”时戒慎恐惧，旨在“存天理之本然”；“君子慎其独”意在“已发”时谨慎于“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旨在“遏人欲于将萌”。这就把“慎独”理解为谨慎于“己所独知”的内心活动，把关注点直指人的行为背后、更为精微的心灵。

第五，与郑玄、孔颖达把“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解说为“人君所能至极中和，使阴阳不错”则“天地位、万物育”不同，朱熹《中庸章句》以为“致中和”就能达到“静而无一息之不中”而“吾心正”，“动而无一事之不和”而“吾气顺”，因而能够把握“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在此基础上，通过“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就可以实现“天地位”、“万物育”。

第六，与郑玄、孔颖达将“君子之道费而隐”解说为“道德违费则隐”不同，朱熹《中庸章句》将“费”释为“用之广”，将“隐”释为“体之微”，进而阐述了道兼体用、体在用之中、用是体之发见、体用同源等问题，特别是通过讨论道之用广以及体在用之中，以说明道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并且要求“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极其至”，达到“天地圣人之所不能尽”。

第七，与郑玄、孔颖达把“诚”理解为“信”而内涵于“三达德”、“五达道”之中不同，朱熹《中庸章句》从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层面，把“诚”界定为“真实无妄”，既是“天理之本然”，又是圣人之德，并为人性所固有，从而把“诚”看成是“三达德”、“五达道”的形上学基础，而且还进一步讲“诚”所以“成己”，“成己”然后“成物”，引领儒学进入了新的高度。

第八，与郑玄、孔颖达把《中庸》第三十三章引《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中的“不显”解说为“显”不同，朱熹《中庸章句》以为这里的“不显”意在不显，以此推崇圣人的“不显之德”，以阐发圣人幽深玄远之意和“不显之德”的成德之序，因而要求在极盛之时，不求人知，然后“反身以谨独”，“以驯致乎笃恭而天下平之盛”，从而达到“中庸”之极致。

第九，与郑玄、孔颖达把《中庸》分为上、下两篇不同，朱熹《中庸章

句》把《中庸》整合为首尾一贯的完整一篇，并且强调《中庸》前半部分讲“中庸”，旨在讲“中即诚”；后半部分讲“诚”，旨在讲由“诚”而“中庸”，从而提出“诚”为《中庸》之枢纽，以“诚”贯穿于《中庸》之始终，把儒家《中庸》学推向了又一个更高的层次，体现出“诚”是朱熹学术的最高境界。

除此之外，朱熹还对《中庸》中所提出的其他许多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诠释，并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思想，举例如下：

对于《中庸》讲“未发”、“已发”，朱熹讲心的“未发”、“已发”，以为“未发”时“心具众理”，“未发”与“已发”不可截然分开；同时，又在此基础上讲“敬”，讨论“敬”与“未发”、“已发”的关系，要求以“敬”贯穿于“未发”、“已发”之始终，并且还进一步认为，“诚”比“敬”更为根本。

对于《中庸》讲“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朱熹通过分析“君子”与“小人”对于“中庸”的不同作为，进一步讨论了“知、仁、勇”及其与“中庸”的关系，认为“知”应当知而不过，并且兼行而有仁；“仁”则在于能择、能守，不仅出自真知，而且需要“无一毫人欲之私”；“勇”就是坚守到底。所以，朱熹认为，知、行依乎中庸，并且能够坚守，不半途而废，这就是“知、仁、勇”的中庸之德。

对于《中庸》讲“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朱熹讲“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不可偏颇，并且强调“以尊德性为本”、“以尊德性为主”，同时又十分重视“道问学”，强调二者“交相滋益、互相发明”。在如何“尊德性而道问学”问题上，朱熹讲“存心”与“致知”交相发明，“如车两轮，如鸟两翼”，既强调“存心”在于“敬”，以“敬”为致知之本，又反对把持敬与致知割裂开来，并且还认为，涵养与致知“本不可先后，又不可无先后”，要求既“以涵养为先”，又不可“专于涵养而不致知”。

对于《中庸》讲“至圣”、“至诚”，朱熹把二者统一起来，讲圣人至诚，而能尽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能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并以此阐述圣人与天地同体、同用、同德，至圣与至诚互为表里，至诚之道与至圣之德并非二物，从而以“诚”把圣人之德与天地之道合二而一。

由此可见，朱熹《中庸》学不仅深入阐述天道、人道，探讨心性、修养，最能体现朱熹的学术思想，而且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思想，是中国古代《中庸》学的新发展。尤其是，朱熹《中庸》学从人与自然统一的视角强调人与物的共同性，从天道与人道统一的层面强调真诚、真实，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舒缓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有积极意义的。

现代学者对于朱熹学术的研究，大都先是从一些哲学概念出发，研

究朱熹的理气论、心性论、格致论、理欲论，诸如此类。近年来，学者越来越注重研究朱熹经学，特别是研究朱熹“四书”学及其与理学的关系，其中也涉及朱熹的《中庸》学。但是，这些研究更多的是从宏观上探讨朱熹经学与理学二者的相互关系，对于其中具体的思想内涵、概念转换和内容阐述，尤其是对朱熹如何通过经学阐发理学的概念和思想，实现从经学向理学的过渡，还缺乏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至于更加具体而直接地从朱熹《中庸》学入手，研究其与理学的关系，则尚待展开。

“中庸之难行”^①，“《中庸》之书难看”^②，朱熹《中庸章句》亦难读，但是，又不能不读。本书运用大量翔实的资料，深入分析朱熹《中庸》学的学术背景、思想来源；通过朱熹《中庸》学思想与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庸》以及“北宋五子”及其门人《中庸》学的比较，展示朱熹从理学角度对《中庸》的独特解说和创造性诠释，尤其是对中庸、天道人道、心性、慎独、已发未发、诚等诸多概念的发挥与创新，全面系统地阐释朱熹《中庸》学思想及其对儒家《中庸》学的继承和发展，从新的视角揭示出朱熹“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丰富思想内涵，以及朱熹理学天人合一的“诚”的最高境界。

①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四）卷六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528页。

②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四）卷六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479页。

第一章 《中庸章句》的形成

宋代是《中庸》学的兴盛时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朱熹继承和发挥二程的《中庸》学思想，辨析和修正各家对《中庸》的解说，重新诠释《中庸》大义，成就《中庸章句》。

第一节 学术背景

《中庸》原集于儒家经典《礼记》之中而流传。东汉班固(32—92年，字孟坚)所撰《汉书·艺文志》著录《中庸说》二篇，可能是最早对《中庸》的解说。郑玄(127—200年，字康成)注《礼记》，对其中第三十一篇《中庸》作了注解。

《中庸》作为单篇而受到关注，大致始于南北朝时期。据《隋书·经籍志》载：宋散骑常侍戴颙撰《礼记中庸传》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讲疏》一卷，此外，还有《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其中戴颙(378—441年，字仲若)与道教、佛教都有交涉；而梁武帝(萧衍，464—549年，字叔达)则是出于道教而宗佛教；《私记制旨中庸义》可能也为梁武帝所作。^①为此，余英时提出一假设之说：“《中庸》的发现与流传似与南北朝以来的道家或佛教徒的关系最为密切。”^②

唐代孔颖达(574—648年，字冲远)在东汉郑玄注《礼记》的基础上作疏，而有《礼记正义》，其中包含了对于《中庸》的注疏，成为宋代之前儒家解说《中庸》的重要代表作。与孔颖达不同，韩愈、李翱较多地关注《中庸》的“性命”之学和“诚明”思想。韩愈(768—824年，字退之，世称韩昌黎)的《省试颜子不贰过论》指出：“夫圣人抱诚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发诸中形诸外者，不惟思虑，莫匪规矩，不善之心无自入焉，可择之行无自加焉，故惟圣人无过。……《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自诚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无过者

① 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47页。

②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86页。

也。‘自明诚’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不勉则不中，不思则不得，不贰过者也。”^①李翱(772—836年，字习之，谥号“文”)撰《复性书》，旨在阐发《中庸》思想。据《复性书》所述，曰：“敢问何谓天命之谓性？”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谓道，何谓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诚也；至诚者，天之道也。诚者，定也，不动也。”“修道之谓教，何谓也？”曰：“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修是道而归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则可以教天下矣。”^②李翱还说：“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③因此，应当“妄情灭息”，以“复其性”。他说：“妄情灭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虚，所以谓之能复其性也。”^④而且，只有复归到“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的“至诚”之本，才能“无不知也，无弗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这就是《中庸》所谓“诚则明”。^⑤

宋代《中庸》学的发展，肇始于佛教徒释智圆(976—1022年，字无外，号中庸子)。陈寅恪指出：“北宋之智圆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号中庸子，并自为传以述其义(孤山闲居编)。其年代犹在司马君实作《中庸广义》之前(孤山卒于宋真宗乾兴元年，年四十七)，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⑥稍后，开宋代儒学之先河的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谥号“文正”)以《中庸》授张载^⑦。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世称安定先生)著《中庸义》^⑧，其同调，闽中的陈襄(1017—1080年，字述古，世称古灵先生)著《中庸义》^⑨。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谥

① (宋)朱熹：《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十四《省试颜子不贰过论》，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 (唐)李翱：《李文公集》卷二《复性书中》，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 (唐)李翱：《李文公集》卷二《复性书上》，四部丛刊初编本。

④ (唐)李翱：《李文公集》卷二《复性书中》，四部丛刊初编本。

⑤ (唐)李翱：《李文公集》卷二《复性书中》，四部丛刊初编本。

⑥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52页。

⑦ 据《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所述，张载二十一岁时，上书谒见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见《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第381页。

⑧ (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一册)卷一《安定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25页。

⑨ (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一册)卷五《古灵四先生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228页。

号“文忠”)^①则认为,《中庸》“有异乎圣人者”^②。

北宋中叶之后,宋代儒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诸多学派,形成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新学,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温公学派,以苏轼为代表的苏氏蜀学派,以及以周敦颐濂学、邵雍象数学、张载关学以及二程洛学为代表的理学派。他们对于宋代《中庸》学的发展,都发挥了各自的重要作用。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世称临川先生、王荆公,谥号“文”)着重于对《中庸》思想的运用。他解《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曰:“中所以本道之体,其义达而为和,其敬达而为祗,能和能祗则庸德成焉。庸言之信,庸行之谨,在《易》之乾,所谓君德。”^③他还解《尚书·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曰:“始曰‘无偏无陂’者,率义以治心,不可以有偏陂也;卒曰‘无反无侧’者,及其成德也,以中庸应物,则要之使无反侧而已。路,大道也;正直,中德也。始曰‘义’,中曰‘道’,曰‘路’,卒曰‘正直’,‘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谓也。”^④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谥号“文正”)作《中庸广义》,要求“心”存乎“中”。他的《中和论》指出:“君子从学贵于博,求道贵于要,道之要在治方寸之地而已。《大禹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危则难安,微则难明,精之所以明其微也,一之所以安其危也,要在执中而已。《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君子之心,于喜怒哀乐之未发未始不存乎中,故谓之中庸。庸,常也,以中为常也。及其既发,必制之以中,则无不中节,中节则和矣。”^⑤在司马光看来,治心的关键在于“执中”,未发“存乎中”,已发“制之以中”,这样就能“无不中节”。所以,他又说:“治心养气,专以中为事。动静语默,饮食起居,未始不在乎中,则物虽

① 欧阳修以文学而著称,在儒学上也颇多贡献,撰有《诗本义》十六卷、《易童子问》三卷、《易或问》(两篇)、《春秋论》、《春秋或问》等,清黄宗羲、全祖望的《宋元学案》专列有《庐陵学案》予以论述。

② (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八《问进士策三首》,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 (宋)王安石:《周官新义》卷十《春官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五《洪范传》,四部丛刊初编本。

⑤ (宋)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一《中和论》,四部丛刊初编本。

辐凑横至，一以中待之，无有不中节者矣。”^①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②撰《中庸论》三篇，认为《中庸》之要有三：“其始论诚明之所入，其次论圣人之道所从始，推而至于其所终极，而其卒乃始内之于中庸。”^③关于“诚明”，苏轼引《中庸》所谓“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曰：“夫诚者，何也？乐之之谓也。乐之则自信，故曰‘诚’。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谓也。知之则达，故曰‘明’。夫惟圣人，知之者未至，而乐之者先入。……若夫贤人，乐之者未至，而知之先入。”^④关于“圣人之道所从始”，苏轼指出：“君子之欲诚也，莫若以明。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观之于其末，则以为圣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乐者。夫如是，则虽欲诚之，其道无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晓然，知其当然，而求其乐。”^⑤关于“中庸”，苏轼说：“夫君子虽能乐之，而不知中庸，则其道必穷。……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笃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终日安行乎通途，夫虽欲不废，其可得邪？”^⑥

朱熹的思想继“北宋五子”而来。周敦颐(1017—1073年，字茂叔，世称濂溪先生)著《通书》，阐发《中庸》“诚”论。明刘宗周(1578—1645年，字起东，号念台，世称戡山先生)称：“濂溪为后世儒者鼻祖，《通书》一编，将《中庸》道理又翻新谱，直是勺水不漏。”^⑦周敦颐《通书》讲《中庸》“诚”论，与《易传》相互印证，指出：“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⑧又说：“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⑨

① (宋)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三《答韩秉国书》，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 苏轼不仅以文学称于时，而且在儒学上也颇多研究。据《宋元学案》载：苏轼“成《易传》，复作《论语说》，后作《书传》等。参见(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四册)卷九十九《苏氏蜀学略》，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3287页。

③ (宋)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中庸论上》，四部丛刊初编本。

④ (宋)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中庸论上》，四部丛刊初编本。

⑤ (宋)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中庸论中》，四部丛刊初编本。

⑥ (宋)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中庸论下》，四部丛刊初编本。

⑦ 引自(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一册)卷十一《濂溪学案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482～483页。

⑧ (宋)周敦颐：《周敦颐集》卷二《通书·诚上》，北京，中华书局，2009，第13～14页。

⑨ (宋)周敦颐：《周敦颐集》卷二《通书·诚下》，北京，中华书局，2009，第15页。

邵雍(1011—1077年,字尧夫,谥号“康节”)亦发挥《中庸》“诚”论,以为他的“先天学”源于《中庸》所言至诚之心。他说:“先天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也。先天学主乎诚,至诚可以通神明,不诚则不可以得道。”^①他还诠释《中庸》所谓“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指出:“资性得之天也,学问得之人也。资性由内出者也,学问由外入者也。自诚明,性也;自明诚,学也。”^②并解说《中庸》所谓“至诚无息”曰:“惟至诚与天地同久,天地无则至诚可息;苟天地不能无,则至诚亦不息也。”^③

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的学术始于范仲淹所授《中庸》,“以《中庸》为体”^④。他指出:“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⑤他所撰《正蒙》中有《诚明篇》、《中正篇》阐述《中庸》思想。他的《诚明篇》明确提出“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⑥,因而非常重视“诚”,并诠释《中庸》所谓“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曰:“诚有是物,则有终有始;伪实不有,何终始之有!故曰‘不诚无物’。”^⑦他还用《易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诠释《中庸》所谓“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指出:“‘自明诚’,由穷理而尽性也;‘自诚明’,由尽性而穷理也。”^⑧他的《中正篇》讲“中正然后贯天下之道”,并且指出:“知德以大中为极,可谓知至矣;择中庸而固执之,乃至之之渐也。”^⑨他还诠释《中庸》所谓“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曰:“不尊德性,则学问从而不道;不致广大,则精微无所立其诚;不极高明,则择乎中庸失时措之宜矣。”^⑩

程颢(1032—1085年,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年,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大力推崇《中庸》。程颢指出:“《中庸》之言,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⑪又说:“《中庸》始言一理,中散为万

① (宋)邵雍:《皇极经世书》卷十三《观物外篇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宋)邵雍:《皇极经世书》卷十四《观物外篇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宋)邵雍:《皇极经世书》卷十四《观物外篇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引自《朱轼康熙五十八年本张子全书序》,《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第396页。

⑤ (宋)张载:《经学理窟·义理》,《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第277页。

⑥ (宋)张载:《正蒙·诚明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第20页。

⑦ (宋)张载:《正蒙·诚明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第21页。

⑧ (宋)张载:《正蒙·诚明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第21页。

⑨ (宋)张载:《正蒙·中正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第26、27页。

⑩ (宋)张载:《正蒙·中正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第28页。

⑪ (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二程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130页。

事，未复合为一理。”^①程颐说：“善读《中庸》者，只得此一卷书，终身用不尽也。”^②据《宋史·艺文志》记载，程颢撰《中庸义》一卷；据宋晁公武（生卒年不详，字子止，号昭德）所撰《郡斋读书志》记载，程颢撰《明道中庸解》一卷。但据宋杨万里（1127—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记载：“世传大程子《中庸》之书，非大程子之为也，吕子大临之为也。”^③朱熹也说：“（《中庸》）明道不及为书，今世所传陈忠肃公（陈瓘）之所序者，乃蓝田吕氏所著之别本也。”^④以为所传《明道中庸解》实为二程门人吕大临所作。另据传，程颐曾作《中庸解》，后因自己不满意而焚之。^⑤朱熹也说：“伊川先生为《中庸解》，疾革，命焚于前。门人问焉，伊川先生曰：‘某有《易传》在足矣，何以多为？’。尝见别本记或问和靖（尹焞）：‘据《语录》，先生自言《中庸》已成书，今其书安在？’和靖曰：‘先生自以为不满意，而焚之矣。’此言恐得其真。若无所不满于其意而专恃《易传》，逆废《中庸》，吾恐先生之心不如是之隘也。”^⑥现存《河南程氏经说》有《中庸解》一卷，书后有编者按语：“按晁昭德《读书志》，有明道《中庸解》一卷，伊川《大全集》亦载此卷。窃尝考之，《中庸》，明道不及为书，伊川虽言已成《中庸》之书，自以不满其意，已火之矣。反复此解，其即朱子所辨蓝田吕氏讲堂之初本、改本无疑矣。”^⑦

二程题解《中庸》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⑧程颢还说：“中则不偏，常则不易，惟中不足以尽之，故曰中庸。”^⑨程颐则说：“中者，只是不偏，偏则不是中。庸只是常。犹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

①（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四，《二程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140页。

②（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二程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174页。

③（清）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五十一《礼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中庸集解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⑤（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二程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175页注。

⑥（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尹和靖手笔辨》，四部丛刊初编本。

⑦（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经说》卷八《中庸解》，《二程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1165页。

⑧（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七，《二程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100页。

⑨（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二程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122页。